

半院花草半室書



在今天的美國，甚至到普通意義上的西方國家——要不是超級大都會——

經過一、二十年的奮鬥努力，擁有一處獨立宅院，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所謂獨立宅院，指的是一座獨立的房子，不大不小的庭院，外帶車庫。像在波士頓的劍橋市、薩默維爾市，居民們基本上都是住在這樣的獨立宅院裡，住公寓者甚少。在波士頓城中心（downtown），因為地皮昂貴，更多人則住在公寓式或聯排別墅式的房子裡，這就是城裡與城郊的差別。

在今天的上海，人們對於獨立宅院的理想，已經被別墅這個概念異化掉了。在人們的印象中，別墅是超級富人的生活，不是普通人的夢，因為這樣的生活，對於普通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其實在中國鄉下，一般百姓住的都是獨立宅院。

只是這種獨立宅院在建築設計、材料、品質以及周邊環境與配套公共服務等方面，又不能與城裡所謂別墅相提並論，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就出現了鄉下的獨立宅院與城裡的別墅各自分解擁有一部分美國獨立宅院的內涵這種特殊現象。我們的生活，就這樣被撕裂著。

其實，擁有獨立宅院並不是因為富有，儘管這也是達到基本富裕的標註之一，但這種富裕，更多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富裕，而不是以小部分先富起來的富裕，換言之，這種基本富裕，是中產階級可以為之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標準。而且，即便是擁有了這樣的獨立宅院，也並非是日炫富、夜夜笙歌。對此，中國人自己其實早就有非常好的文化傳統。

遠的不說，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在北京的一個名叫「羊圈胡同」的普通市民區裡，就曾經達到過上面所謂獨立宅院生活的硬指標和軟指標。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

他常常想起小羊圈一號來。院子裡有那麼多的花，屋中是那裏安靜寬闊，沒有什麼精心的布置，而顯出雅潔。那裡的人是默吟與孟石，他們有的是茶，酒，書，畫，雖然也許沒有隔層的糧米。在那裡談半天話是多麼快活的事，差不多等於給心靈洗了個熱水浴，使靈魂多出一點痛快的汗珠呀。可是，北平亡了，小羊圈一號已住上了日本人。日本人享受著那滿院的花草，而消滅了孟石、仲石、與他的胞姐。憑這一點，他也不該去從日本人手中討飯吃吧？

羊圈胡同一號主人的生活被摧毀了，摧毀他們生活的，並不是為富不仁，也不是作惡多端，更不是所謂富不過三代一類的鐵律，而是戰爭和侵略者的野蠻。而且，其實在這樣一座不大的獨立宅院裡的生活，也並非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必須要具備怎麼的硬標準，事實上，錢默吟父子一家在經濟上根本達不到所謂富裕，但他們過著一種獨立的、自足的生活——尤其是在精神上。院子不大，並不需要車庫或者豪華，但不可無花；房子雖獨立，但也不需要太大，但得有書。半院花草半室書，就是錢默吟一家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在當時的北京城，是一種職業或一個階層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在三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戰爭中也被毀掉了。

在今天的中國，所有的城郊或鄉鎮，人們基本上達到了擁有一幢自己的獨立宅院的生活標準，而且這大概也是一種基本生活標準。美國人對於房子的概念，與中國人對於房子的概念，尤其是如今都市裡的中國人對於房子的概念，已經大大地不同。令人感慨的是，並不是只有今天的美國人所擁有的獨立宅院，而且還有他們在這樣的獨立宅院裡，幾乎家家戶戶所實現的那種「半院花草半室書」的生活，似乎已經根深蒂固，不會被誰奪走或水沖走了。換言之，這已經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生活。

美國人的幸運是令人羨慕的，但這樣的生活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任何一個看過一番美國人的生活的旅行者，無論是否領悟到了美國文化與美式生活的真諦，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僅僅只有獨立宅院還是不夠的——房子建起來並不那麼難，但配得上住這樣房子的人，要培育出來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郭正鋼的標本意義



商子雍

在陸續被押上審判台的內地官員中，郭正鋼的官階不算大，但此人落馬的影響，卻非同小可。這是由於郭正鋼的父親郭伯雄。現在，趁著等候的空兒，不妨去查查郭正鋼的腳印，看能不能從中得到某種啟示。

遺憾的是，官方在網上公布的郭正鋼少將履歷，大體簡單就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出生。一九八三年三月參加工作，下就是：「曾任浙江舟山市警備區政委，浙江省雙擁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浙江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正師職）。二〇一四年十二月浙江省軍區副政委。二〇一五年一月晉升少將軍銜。」

在地方參加工作後，發展似乎也不是十分理想。郭伯雄大權在握，他進入部隊後，這以後，有賴於郭伯雄大權在握的庇護，順風順水地沿著官階進步的坦途一路狂奔。四十五歲的副軍級高官，這在中國軍隊極為罕見，但郭正鋼居此高位，完全（或主要是）憑藉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嗎？

有（或主要是），在查查郭正鋼履歷的過程中，還和另一位郭姓高官不期而遇。此人是在禮泉縣新時鄉信用社當會計。但隨著郭伯雄在中國軍界和政壇的崛起，此郭步入官場，一路高升，到二〇一二年一月，已經「茁壯成長」為一名正廳級高官。

郭正鋼被查，原因肯定涉及貪腐，劣跡跡來和其他貪官大同小異，沒有多大的談論價值。倒是此人的晉升經歷，極具標本意義，足以發人深省。現在，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種高尚追求，但必須高度警惕的是，有些身居高位者的作為，全都展現著中國特色的糟粕，卻半點兒社會主義也沒有。郭伯雄兒子和弟弟的晉升，倘若放在民主、法治、平等、公正這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秤上認真秤一秤，不難發現，其中充斥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類的腐臭氣味，讓人作嘔！

在中國，無論是在官場抑或民間，對權力的認知，一直多有不足乃至偏差。利用公權謀私利（特別是謀取那些似乎是非物質的私利），不說被視為理所當然，起碼也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容忍。請想一下，倘若不是涉及貪腐，誰又能把郭正鋼這樣明顯依仗老子的權力獲得高位的傢伙拉下馬呢？只是不杜絕郭正鋼式的吏治腐敗，最後就會使得掌握權力的官員及其家屬，還有與權力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糾合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瘋狂侵吞各種社會資源，而受苦大眾，則在劫難逃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不合時宜的思想

李慶西



高爾基企盼著俄羅斯的「精神復活」，這是他一輩子的理想。在那個苦難與動盪的時刻，他對文化的命運尤為擔憂。他知道，專制、愚昧以及人性中一切卑劣的東西，都是擺脫了文化的規束而大搖大擺走上前台。

經歷過二十世紀的革命與冷戰，對知識界吠形吠聲的思想陋習，世人總算見得多了，血水與淚水不斷記錄著歷史的教訓，卻不斷被匆忙翻過。當這個世界一再被格式化之後，資本全球化的表述又成了新的神話。其實，那些關於發展戰略之類的高談闊論多半是扯淡，只要看看世上貧富差距愈益擴大的現實，可知早年的理想主義未必盡是痴人說夢。上個世紀初葉的故事的確過於悲愴沉重，諸般是非曲直可謂一言難盡，如今更在「知識」層面上被攪得混亂不堪。比之許多人文學者的宏篇大論，倒是當日少數文學家的即興描述向世人留下一份歷史。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寫下的那些飽含感情的文字就是這樣一份歷史檔案，它告訴後人：當初革命是怎樣發生的，又是怎樣被扭曲，那些自由、公正的訴求怎樣就變成了「陰暗、尖刻和兇狠」的病態心理。

收在《不合時宜的思想》書中的幾十篇時論散文寫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是高爾基編輯《新生活報》期間主撰的一個專欄。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風雲激盪的社會形勢讓高爾基的頭腦一刻不寧，他似乎沒有感受到這個「盛大節日」的喜悅，倒是憂心忡忡地關注著「俄羅斯的自發力量」的四處蔓延。高爾基描述的「自發力量」，具有破壞力極強的草根性，正如書中第四十二篇所說，當革命家們呼喊社會革命的口號時，「身心備受折磨的人民用

自己的語言把這些口號翻譯成下面幾個簡單的詞：『攻擊，搶奪，毀壞……』」普遍的無政府狀態，趁亂而起的群眾專政，成了革命時期話語權力對道德良知進行顛覆的完美風暴。在一篇未收入此書的文章裡，高爾基引述了兩個街頭閒淡的閒聊——「總算活到了完全自由的日子了。」「是啊，警察沒了，法院也沒有……」（《快樂的事》）無產階級砸爛了舊的國家機器，高爾基看到的是俄羅斯庭院裡撒落一地的精神殘骸。一九一八年元旦那天高爾基寫下本書的第七篇，那是「革命正在深入」的事實，「在工廠裡，幹粗活的工人對技術工人們的充滿惡意的鬥爭正在逐漸地展開，幹粗活的工人們開始說什麼，鉗工、車工、鑄工等等都是『資產者』。」這是革命狂歡之後的再度釋放，階級鬥爭開始進入「細分市場」階段，人與人的每一個微小差異都在努力地擦出火花。高爾基把這稱之「奴才們的打鬥」——可怕的是，對許多人來說這種精神上的「奴才」地位可能要持續終身。所以，他說「最令我震驚，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沒有帶來人的精神復活的徵兆……」

高爾基企盼著俄羅斯的「精神復活」，這是他一輩子的理想。在那個苦難與動盪的時刻，他對文化的命運尤為擔憂。他知道，專制、愚昧以及人性中一切卑劣的東西，都是擺脫了文化的規束而大搖大擺走上前台。在書中第十一篇中，他講述了一個半吊子詩人的故事，那年輕人不肯讀書，也看不起農民，總以為別人不能理解他。他呢，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那口氣聽上去跟今天中國的許多年輕人沒什麼兩樣，他當然不會意識到自己身上正顯露著歷史轉折時期的「人的普遍野蠻化」徵象，高爾基帶著惋惜和挖苦的口吻寫道，「他憂愁地走了，我知道，他將毫無益處地耗掉兩三年，甚至五年時間，去『實現』對他來



《不合時宜的思想》

說不可能實現的願望，即做一不象別的人。」當然，「文化」一詞在高爾基心目中不是指文憑，也不是「文化人」的身份之類，如果說得簡單些就是跟「野蠻」一詞的區別。所以，當人們開始以革命的名義戕害革命的理想的時，他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那種善惡顛倒之勢，因為那跟野蠻沒有區別。在第三十八篇中，他憤怒地指出，「我不能認為，像在冬宮、加特契納宮及其他宮殿裡盜竊國家財產的事實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明白，毀壞莫斯科小劇院和在我們的著名女演員葉爾莫洛娃的化妝間裡進行偷盜同『千年國家制度的瓦解』又有什麼聯繫？」批評高爾基的人們譏嘲他以吹毛求疵的態度看待一場大革命，過去的無產階級作家成了「貴族老爺」了。然而，高爾基的目光並不僅僅盯着街頭打砸搶的事兒，在第四十篇中他直截了當闡明了對這場革命的基本看法——「人民委員們對待俄國就像對待實驗用的材料一樣，在他們看來，俄國人民是一匹細菌學家們為使馬的血清中產生傷寒血清而為之接種傷寒菌的馬……斯莫爾尼宮的改革家們顧不上俄國，他們冷漠地要把他變成他們關於全世界的革命夢或歐洲革命夢的犧牲品。」作為一向同情布爾什維克的民主派作家，高爾基在一九一七年革命進程中發表的言論確實異乎尋常，這跟後來蘇聯文學史所塑造的高爾基形象大相逕庭。

高爾基的這些文章跟他的小說一樣，字裡行間時時交織著來自底層的生活智慧和文人的道德良知，把人道主義的真摯情感奉獻給他的讀者。他與當日人民委員們的分歧主要就在對人和人性的認識上，在第四十篇的結尾處他沉痛地表示，「只要我還有可能，我就會對俄國無產者說：『人家在把你們引向死亡，在把你們當作無人性的試驗材料使用，在你們的領袖眼中你們仍然不是人！』」後來他就不可能再說這樣的話了。不過，對於革命以後政治宣傳營造的那種「粗野情感的氛圍」，他還是忍不住要說幾句，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的專欄文章依然批評當局，「把人關在豬圈裡，還要他成為天使，這種要求是愚蠢的。」

當時，一位工人意識到時局的悲劇性，給高爾基寫信說，「我擔心，有朝一日群眾將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滿，對最美好的東西永遠失望，將永遠失去社會主義信念……」歷史證明了這種擔心並非多餘。

高爾基與斯大林

（資料圖片）



唐朝僧人辯才和尚得了師傅傳贈的《蘭亭序》真跡，珍愛異常，並鑿空房樑匿之。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得知《蘭亭序》收藏在辯才手中，便欲以重金購得，但被辯才婉拒。求之不得，太宗便派蕭翼去騙。蕭翼偽作書生至辯才所在的永欣寺，博得辯才對其一見如故。於是，蕭翼留住寺內，二人每日清談賦詩，相談甚歡。半月有餘，辯才對蕭翼之才日益欽佩，心中全無戒備，蕭翼便將話題慢慢引向書畫，並拿出幾幅二王的雜帖向辯才誇耀。辯才不屑，亮出了自己的《蘭亭序》真跡。之後自然是蕭翼和真跡一同消失。

米芾是北宋的書畫大家，對古人書畫及文房佳品都異常喜愛，即使皇上的端硯他喜歡了也會死乞白賴地要到手，因此也成名為「米癩」。米芾還有一手絕活是善臨古人書畫，且達登峰造極的地步。他不時四處尋覓古人書畫，然後借回來仔細揣摩後又認真臨摹。到了該將原作歸還藏家時，米芾則總會將真跡和自己的臨摹品一起拿給人家讓其自選，藏家真假難辨。米芾以此法得了許多真跡。

人們將世間的東西分著雅俗，將愛好雅俗兩物的人也以雅俗區分。所以搶人錢財的叫強盜，偷人財物的叫小偷；而掠人雅物的也不過是並不指責的「癩」，是雅士，是風流倜儻。唐太宗因蕭翼「竊」帖有功，授其員外郎，另外也賜了《蘭亭序》的辨才綿緜三千匹，稻穀三千石。但辨才終是痛心難平，一年有餘，便命歸西天。唐太宗則在自己死後將真跡也做了隨葬品。早知米芾是藏家，卻不知道他私品如此。一次，米芾到丹陽，太守宴請他，說：「今日為君作河豚羹。」知道河豚有毒，米芾有些猶豫，太守笑道：「公勿疑，此河豚實本耳。」雖是玩笑，仍不免是勸諷。

前人曾說，有寶器，私於一家，則出於一家之外為失矣；私於一國，則出於一國之外為失矣；若私於天下，則將安所失矣？前人怕是過於理想了，私於天下之物，大約只有陽光。現實中人們都是想私於一己的，所以，中國人一向是以君子不奪人之美為準則的。



雅盜雅竊

魯迅是將人性看得透徹，揭得透底的。不過看得到人的骨子裡的魯迅卻仍會上當。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魯迅收到史濟行從寧波發來的信，先說曾與柔石、殷夫等人拜訪過先生；再說：「鑒於國內文壇之消沉，正當編一本《新文學》月刊，並列出一大串已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年輕作家；最後是請魯迅一惠賜大作」。魯迅編輯《語絲》時，史濟行曾自稱藝術專門學校的學生，投稿揭露當時文壇上的劣跡，實則是搬弄是非。魯迅即拒絕人手刊登，結果，史濟行便在刊物上捏造魯迅的謠言。已經領教過史濟行劣技的魯迅，接信後並未理睬。

之後，史濟行投書數次給魯迅及許廣平，變幻花招，找各種理由，信口給予各種優惠條件，只希望騙取魯迅的稿件。魯迅在日記中記到「無恥之尤」。卻始終對其置之不理。

一九三六年三月，史濟行則假借齊濟之名從武漢給魯迅寫信，稱自己與「白莽」是同濟學校的同學，藏有他的遺稿《後兒塔》，正在經營出版。但出版家有一個要求，要魯迅做作一篇序方可出版。白莽是魯迅的一位年輕朋友，一九三一年初與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一起在上海龍華華被國民黨殺害。他們遇害後魯迅曾寫了《為忘却的懷念》。雖然，《後兒塔》的遺稿已由魯迅收藏，但他覺得也許會有別的朋友，魯迅在白莽朋友中。為了紀念逝去的朋輩，魯迅有懷，便力疾為之寫了兩篇，到第二天付郵寄。完成了《白莽作〈後兒塔〉序》，結果大上史濟行之當。幾天後有報刊揭露了史濟行化名齊濟之名義四處騙取文稿的卑劣手段，又過了些日子，魯迅在標明史濟行為主編的期刊預告中發現自己為白莽遺作寫的序稿赫然列於目錄中。於是，憤而撰文揭露史濟行的醜態行徑。

除了被騙文，魯迅還被騙過錢。那是讓一位交往過二十年的朋友坑了。

陳子英在日本留學時與魯迅相識，回國後還曾在魯迅與白莽一起共過事。但魯迅與他的關係似乎並不密切，在給朋友的信中曾說：「與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氣，捨之及復可憐。」

魯迅上當

魯人

正是這位與魯迅認識時間很長，交往不算很深的朋友，在一九三二年初，曾一次性地向魯迅借過五百元。魯迅當時沒有那麼多現金，只好去自己的朋友借，那朋友手頭也沒有這麼多錢，便將一個存有幾百元的存摺交給了魯迅。魯迅又將存摺交給了陳子英。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魯迅在給朋友許壽裳的信中說：「當逃難中，子英曾來囑代為借款，頗頗頗為當人語之謬也，即卻之，但其措措可想，今此回絕，想亦為此耳。」所謂「逃難」指「一二八事變」中，魯迅家臨近戰火，只好全家避難山書店一事。雖然，陳子英借錢時的一些言語已讓魯迅感到不愉快，但想到他的措措，還是在自己逃難，家中遭遇戰火，並被盜的情況下代他借了錢。結果，陳子英懷揣存摺而去。以後，錢不見了，卻向朋友散布，說魯迅賺了大錢，花他一點也應該。但魯迅既未撰文揭露，也不會向朋友傳播他的不講信譽。須知那時的「一千元」可是巨款，此前十年來，魯迅在北京西三條胡同購買了一座狹窄破舊的小宅院，尚用款八百元。此記載於魯迅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記，那可是魯迅的命根子。魯迅去世後，許廣平經濟異常窘迫，曾多次給陳子英去信婉轉地提到借款的事，陳子英從無回音。

陳子英一方面賴帳不還，一方面卻虛情假意地屢次向朋友說：「周信未清，心總不安。」於是，有魯迅的一周信以為真，給許廣平去信，讓她給陳子英去信告知地址，以「需款維持生活」為由催促陳子英。許廣平接信後，在感謝朋友的關心朋友，對魯迅平接信後，在感謝朋友的關心朋友，「子英先生借款是拿不住的」，並說先前，她曾見過陳子英給另一位朋友的信，向那位朋友打聽他的住處，說「要還款即云云」，那時，已在抗戰之中，許廣平因云云為居於北京的魯迅的母親和原配提供生活費，兒子海嬰又常犯哮喘，她自己又無收入，況且「望眼欲穿，結果是空手一場。」

魯迅上當既非貪小便宜，亦非被高額回報障了眼。從魯迅的上當更見他做人的品格，即對逝去朋友的真情，對過去朋友的信任。同時，對文壇小丑必可手揭，對朋友，那怕只是一般的朋友，則寧可自己受損失，也並不去揭揚朋友的過錯。

段懷清

燈下集